



西廂記

楊振雄演出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封面画：杨振雄
封面设计：麦荣邦
插图：程十发

西 厢 记

杨振雄演出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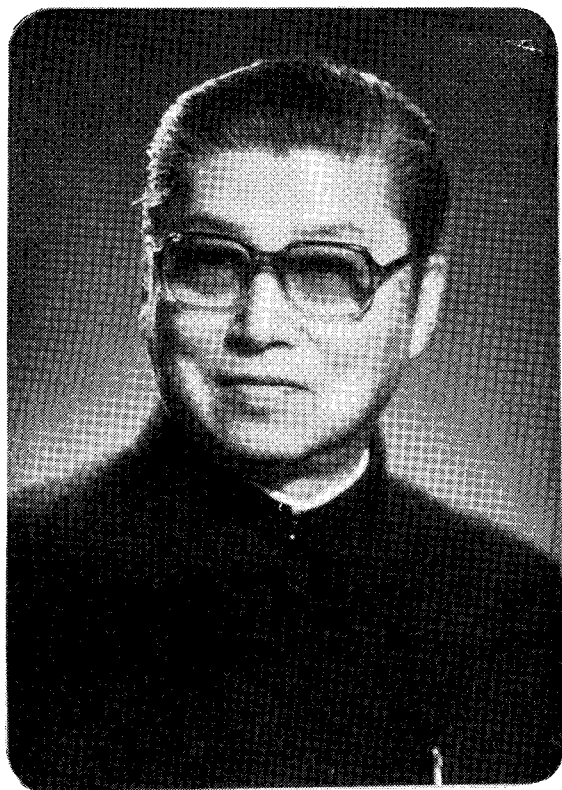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4.25 插页 6 精 9 字数 561,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8,000册(内精装6,000册)

书号：8078·3405 定价：平 2.60元 精 4.4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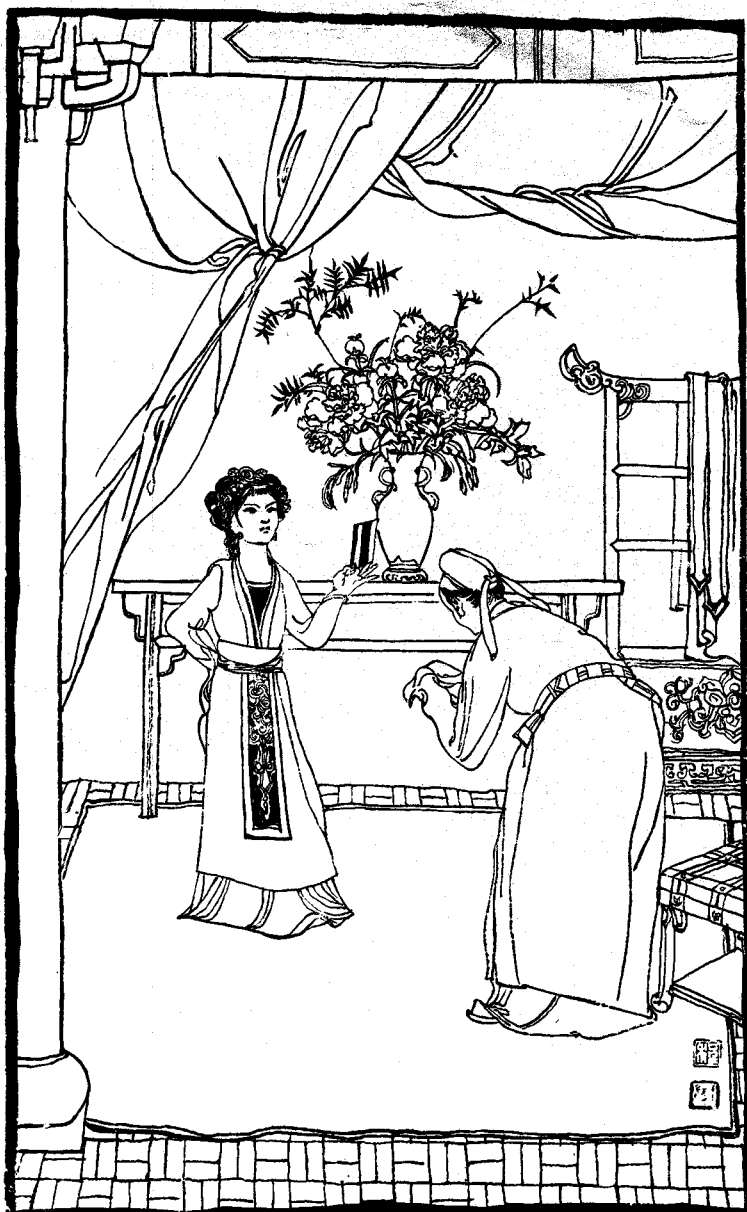
楊作雄



程十髮画















目 录

前言杨振雄(1)

一	游殿	(11)
二	操琴	(63)
三	惊艳	(90)
四	借厢	(143)
五	酬韵	(222)
六	闹斋	(244)
七	寺惊	(277)
八	请宴	(324)
九	赖婚	(379)
十	琴心	(453)

十一	传柬	(476)
十二	闹柬	(494)
十三	回柬	(518)
十四	赖柬	(557)
十五	寄方	(610)
十六	佳期	(632)
十七	拷红	(672)
十八	长亭	(737)

跋：句句言情 篇篇见意 左纭(760)

——读弹词改编本《西厢记》

前 言

《西厢记》故事，源出唐代诗人元稹所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仙）记》）。描述了名门小姐崔莺莺与士人张生相恋，最终又被遗弃的故事。小说中的莺莺，是一个十分感人的艺术形象。她怀有强烈的爱情要求，而思想上却深受封建礼教的禁锢，经常处于谨守礼教与追求幸福生活的复杂矛盾状态之中，以致有时会有与内心完全相反的表现。但是，她那真挚、炽烈的爱情之火，终于使她鼓起了斗争勇气，作出了封建正轨所不容的行为，大胆而坚贞如一地去爱张生。莺莺的形象，客观上体现出当时青年要求爱情自由，妇女要求解放的呼声。小说中的张生，则是一个玩弄女性而不以为耻的封建士大夫。他追求莺莺，是因为见她“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并不存在真实深厚的爱情。小说作者在篇末的议论中，竭力为张生“始乱终弃”的负心行为辩解，把善良多情的莺莺说成“尤物”，辱骂她是“不妖于身，必妖于人”。这正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浓厚封建意识，严重地损害了作品的价值。

从元稹的知己朋友白居易等所作的诗文，以及北宋王性之以来一些学者的考证来看，《莺莺传》带有很大成分的自传性质，张生的形象中有着作者的影子，莺莺则是他早年一度恋爱过的女子。这篇小说的写成，在元稹得中科名之后。当时他为了给自己从统治阶级里找到有力靠山，而跟尚书仆射韦夏卿的小女

韦丛结了婚。那段议论，实际上也是元稹在为自己的行为开脱。鲁迅先生认为他“文过饰非，遂堕恶趣”，是颇有见地的。应该说，《莺莺传》本身，并没有反映婚姻上的“高门”与“寒门”的矛盾，但是元稹的这段经历以及有关的种种考证，恰恰反映出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是个敏感的并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莺莺传》之所以影响极大，流传不息，这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悲剧性恋爱故事，震撼了当时文坛，和元稹同时的杨巨源、李绅等都曾为此作诗。宋元以来，以此为题材改编为戏曲的，更是多至不可胜数。如宋代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关汉卿的《续西厢记》，明代李日华的《南西厢记》、陆天池的《南西厢记》，周公鲁的《翻西厢记》，清代查继佑的《续西厢记杂剧》等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董解元和王实甫的两种本子。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又名《西厢捣弹词》或《弦索西厢》。自北宋至金元，“诸宫调”是一种深受群众欢迎的文艺形式。其特点是，有说有唱，以丝竹乐器作为伴奏。说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为韵文，以诸宫调的许多曲子组成。用同一宫调的几只曲子加“尾声”组成套数，联合各个宫调的套数便形成了长篇巨制。这种形式，便于表现众多的人物，叙述复杂的故事。苏州弹词与“诸宫调”的这种由一人自首至尾的演唱形式是一脉相承的。

董解元的《西厢记》，把《莺莺传》的二千多字，扩充到五万多字，进行了认真而成功的再创造，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尤其是作者从生活中吸取了更丰富的素材，塑造了一些比《莺莺传》更丰满、更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如果说《莺莺传》有着明显的维护封建礼教的倾向，那么《董西厢》则是站在反对立场上来处理人物的。在《董西厢》中，张生不再是“始乱终弃”玩弄女性

的张生，也不是试图以封建教条来为自己的无行进行开脱的张生；而是一个爱入于真，情近于痴，始终忠诚于爱情的形象，是一个有胆量向封建势力挑战，为争取幸福生活斗争的形象。《莺莺传》里的莺莺，是一位被损害受屈辱的弱者，而在《董西厢》中，则是一位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莺莺传》中一笔带过的过场人物红娘，在《董西厢》中成为一个有血有肉、富有性格特征的形象。她热情、机智、富有正义感和斗争性，对于张生、莺莺争取幸福自由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处于奴婢地位的红娘，被作为长篇大作中的重要人物进行歌颂和赞扬，她的形象又被描绘得如此光彩动人，确是一种大胆的难能可贵的创造。《董西厢》在故事内容和情节安排上也有很大改变，以大团圆取得胜利为结局，无疑是符合群众愿望的。这部作品在写作上也较为成功，不仅结构布局宏伟，文字优美生动，善用抒情笔调叙事，而且重视通过矛盾和冲突来展现人物的精神面目。上述可见，《董西厢》在思想、艺术上的成就，都远远超越了《莺莺传》。

元代饶有才华的戏剧家王实甫，以《董西厢》为底本，创作了五本二十一折的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因它的乐谱本以七声音阶的北曲曲牌演唱，故又称《北西厢》。这是元杂剧中一项辉煌成就，是以爱情为题材的杂剧高峰，亦堪称为古代的一部大型诗剧。故事是说：崔相国死后，其妻携女儿莺莺扶柩往原籍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遂羁留河中府普救寺内。白衣秀士（未中功名的读书人）张君瑞，赴京应举，路经普救寺，见莺莺容貌美丽，十分倾慕，于是向寺主租得僧房半间，伺机与莺莺相互留情。叛将孙飞虎听说莺莺美艳，帅五千兵马前来抢劫，全寺惊恐。崔夫人茫然失措，传令倘有能退贼兵者，愿将莺莺配他为妻。张生写信给知交白马将军杜确，解了“普救”之围。不料崔夫人发生

反悔，以“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理由，背信弃义，赖却诺言。她设下筵席，命莺莺向张生敬酒，以兄妹相称。莺莺不愿，掷杯以示反抗。张生也因此致病。莺莺让红娘去探病，张生以书简相托，莺莺回书中以“明月三五夜”诗相约。张生夜间前来赴约，莺莺却责怪张生无礼。张生病况从此日益加重，卧床不起。红娘陪送莺莺去探望张生，莺莺遂与张生成就百年好事。日久机关败露，崔夫人大怒，拷问红娘。红娘将真情实况和盘托出，并数责崔夫人言而无信的过错。崔夫人理屈词穷，进退维谷，只得表面上应允他们成为夫妻，但又提出必须待张生得中状元后方可完婚。张生被迫上京应试，总算状元及第。不料此时莺莺的表兄郑恒却公然造谣说张生已被卫尚书召为女婿，企图破坏崔、张婚姻。直至张生回去，才把事情澄清。郑恒羞惭触树而死，张生方始与莺莺结为美满夫妻。从这些主要情节上看，它和《董西厢》无多差异。但是，由于王实甫的努力，使《西厢记》在各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王实甫不仅堵塞了董著情节中的漏洞，删减了蔓生的枝干，使剧情更为紧凑，并且加强了矛盾和冲突，深化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刻画，使人物性格的发展合情合理，形象更为鲜明。作者善于把古诗词中优美辞章与民间口语有机地糅融在一起，恰当地烘染气氛，使作品充满诗情画意，并能很好地反映剧中人物的个性特征。《王西厢》结构完整，有着强烈的戏剧效果，剧中的主人公张生、莺莺，几乎成了旧时男女青年心目中的爱神。

《西厢记》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它富有人民性的思想内容和积极的社会意义。作品真实地反映了青年一代为了自由表达爱情、自由结合，而与维护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封建势力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封建道德的虚伪、冷酷，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和丑恶。作者热情地

歌颂了青年一代对封建势力所作的斗争，而对封建势力的代表崔夫人则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和鞭挞。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是整个封建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亦即封建经济基础上的庞大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反对和动摇这一婚姻制度的行为和企图，都是直接威胁到统治阶级利益的。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等等，都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这种强迫包办婚姻的教条和手段。因此，《西厢记》中所表达的“愿普天下有情人成眷属”的主题思想，无疑是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具有积极的思想和教育意义。

长时期来，《西厢记》为各剧种争相改编演出，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显示出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似乎可以骄傲的是，用弹词形式演出《西厢记》，比起其它各剧种来，历史更为悠久。如果从董解元作《西厢记挡弹词》算起，已有将近八百年的历史。我们苏州弹词演唱《西厢记》，也可算是返本还原。据我所知，最早说唱苏州弹词《西厢记》的，是朱寄庵先生。他原名姚琴孙，江苏常熟人，先以说唱《三笑》、《双金锭》擅长，后来才编演《西厢记》。我在翻阅寄庵先生有关著述的资料中，发现有这样几句引词：“余擅谱南词，新翻北曲，将东阁有余之兴，撰西厢才子之书。愧无落霞秋水之文，白雪阳春之调，贻笑大方，庶所不免耳。光绪三年，小春书院，朱寄庵自序于苏垣。”光绪三年，即公元一八七七年，他已撰成《西厢》文本，其开始演出的时间或许还要推前。即便以光绪三年计，至今也有百余年的历史了。

朱寄庵先生的《西厢》，蜚声书坛，受到同行的重视。一次，他在太仓演出，当地有位姓汝（一说姓时）的评弹艺人在场内“偷书”。寄庵先生发现此情后，就在台上厉声喝道：“何许人偷我西厢！”这位姓汝的艺人见天机泄漏，不禁面红耳赤，事后即央请人从中斡旋。寄庵先生感其真诚，欣然接受他为学生。汝学成之